

“门神”信仰中的平安共同体意识

——基于华北地区门神年画的考察

张倩倩

(聊城大学 美术与设计学院, 山东 聊城 252000)

摘要:以门神年画为物质载体的门神信仰,是中华民族延绵数千年的民俗文化现象,体现的是民众对平安生活的集体诉求。通过对华北地区门神年画的考察发现,虽然门神年画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但门神信仰所蕴含的平安理念并未发生根本的变化,它同科学理性主义一道为民众构筑了一道安全的屏障。在新时代文化语境下,门神信仰这一民俗传统对当下生活依旧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它在礼俗互动的基础上,实现了民间与国家之间的文化联结与互动,激发了全体民众对家国文化的强烈认同,为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坚实的文化保障,这种信仰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更是对现代社会治理与文化建设的一种有益补充。

关键词:门神信仰;平安共同体意识;平安意识;家国同构;文化认同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217(2025)06-0028-06

收稿日期:2025-09-10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专项(24CFZJ32)平安山东法治山东建设研究专项;乡村社会自治传统对平安山东建设的作用研究。

作者简介:张倩倩,(1987-),男,山东潍坊人,聊城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黄河学研究院讲师,文学博士。

DOI:10.16284/j.cnki.cn37-1401/c.2025.06.012

门神作为中国早期原始宗教中的神祇形象,是人类基于平安意识的神格化构拟,生动地折射出人类对平安愿景的集体诉求。随着思想文明史的演进,门神被赋予了崇高的地位和神圣的功能,逐渐成为上至天子诸侯,下至黎民百姓所尊崇的对象,由此形成的门神信仰成为中华民族延绵数千年的独特文化现象。其中,门神年画作为门神形象的艺术承载物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是门神信仰在民间的生动体现,也是百姓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典型例证。对华北地区门神年画的考察虽无法涵盖门神年画的文化全域,却为解码中国门神信仰的深层价值系统提供了关键路径。

“门神”的最初形象只是一种象征意义上的超然实体,不存在具体的形象所指,随着“门神”信仰在民间的传播与认同,尤其在文学艺术神圣叙事的演绎下,逐渐奠定了其在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因此,对门神信仰这一民俗文化的研究成为当下学术界瞩目的焦点议题。以往的学术研究,往往采用民间史料与艺术图像互证互辩的方式探讨门神信仰背后的文化意蕴。在相关研究成果中,王子今教授认为,“通过对早期门祭到后期门神崇拜的历史文化演进过程的研究,无疑可以认识中华本土文化的一个重要侧面,并由此透见我们的传统民族精神的某些特质。”^①毛巧晖通过对门神信仰的考察,认为“门神信仰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呈现不同的形态,也因历史、政治、经济等各种因素的发展而不断地变化着,但是其驱鬼避灾与迎祥纳福的信仰重心一直保存与延续,也是其得以传承千年的根脉。”^②马艳宁在《弥漫的神性:传统年画中的民间信仰》一文中提出,“传统年画得以产生并世代延续的最重要的文化动力,也正是来自于对门神等神灵的信仰和崇拜。可以说,民间信仰是传统年画的灵魂之所在,抽离了民间信仰内容,年画的文化价值将会被极大地削弱或消解。”^③近几年,随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大理念的提出与持续关注,为民间文化的研究开辟了新的研究思路与学术路径。因此,本文主要立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时代主线,以华北地区的门神年画为主要考察对象,在家国同构的基础上探讨门神信仰中的平安共

①王子今:《门祭与门神崇拜》,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页。

②毛巧晖:《生活化的信仰 信仰化的生活——简论门神信仰的功能》,《殷都学刊》2016年第2期。

③马艳宁:《弥漫的神性:传统年画的民间信仰》,《民俗研究》2021年第6期。

团体意识,以此回应在新时代文化语境下民俗传统的意义与价值,更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丰富的文化资源与精神支撑。

一、平安意识:“门神”信仰的思想基础与文化意涵

平安意识由来已久,其内容与表现形式涉及人类生活的日常方面,从商周时期的“五祀”“七祀”制度,封建社会的“祭天”“封禅”仪式,一直延续到现代社会的“祭祖”“祈福”习俗等民俗文化现象,充分体现了民众对平安的渴求。其中,门神信仰始终贯穿于诸多远古时期到现代社会的种种民俗事象中,反映的是民众长期以来形成的对平安观念的集体无意识。

在未实现农耕定居生活以前的远古时代,原始先民面对自然界的诸多现象,无法做出科学的解释,以原始思维建构下的“万物有灵”观念作为解释未知世界的唯一“科学”方法,“山有山神”“树有树神”“河有河神”成为原始先民对世界的普遍认识。然而,这种“科学”的解释方式并未从实质上解决原始先民的生存问题,飞禽、猛兽的出没仍然是对原始先民生命安全的直接威胁,出于对自身安全和群体繁衍的考量,他们不得不另辟蹊径寻求某种“家”的庇护。据《庄子·盗跖》记载:“古者禽兽多而人少,于是民皆巢居以蔽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①另据《墨子·节用中》所载:“古者人之始生,未有宫室之时,因陵丘、堀穴而处焉。”^②远古时期的巢居和穴居生活为先民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处所,如果这种早期的居住场所可以被视为原始的“家”的概念,那么随着农耕作为经济基础所产生的稳定居所,以及营造居室聚落的建筑文化规范的形成,则意味着真正的“家”的实现。筑室而居的出现改变了原始先民简陋而又危险的生活方式,而家庭观念的形成则代表着物质生活改善背后人类文明史的演进。对于这种文化的演进绝不可轻易从物质生活层面作狭隘的理解,而应当考虑这种变化所影响人类精神世界的意义。正如有些人类学家所指出的,“原始人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万物有灵的和到处都是鬼魂的世界中,暴露在大自然的直接威胁之下,对家的这种感觉较之对大自然已有充分认识的文明人更为强烈。愈是古老和原始的人类,对家的范围便考虑得愈加广阔。”^③

尽管家的出现为原始先民的日常生活提供了必要的安全保障,但战争的动乱与瘟疫的肆虐时常侵扰着本就不甚安定的生活。门,作为沟通家庭与外部世界的屏障与界隔,在先民的意识中具有特殊的文化意义。《淮南子·汜论训》云:“夫户牖者,风气之所从往来,而风气者,阴阳相掎角也,离者必病,故托鬼神以伸诫之也。”^④从现有的考古发掘和民俗志资料中不难发现,原始先民在转为定居生活之初,营造早期住宅和聚落建筑时,已经十分重视“门”的构筑。在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发掘中,发现前仰韶文化居室遗存,有对门棚的设计。湖北枣阳雕龙碑遗址,考古工作者发现了有门轨的横拉式屋门。这种对门的精心设计,并不完全是实用主义的结果,而是隐藏着某种对门的神秘主义信仰和宗教式情结。商代殷墟宫殿建筑基址下埋有牲人和牲畜,每一门址下有四五个性人持戈、盾和贝,这一考古发现恰巧佐证了这一点。另外,商周时代的祭祀制度同样揭示了门在当时所具有的神秘属性。《论衡·祭意》中记载:“五祀报门、户、井、灶、(室)中雷之功:门、户人所出入,井、灶人所饮食,中雷人所托处。五者功钧,故俱祀之。”^⑤另据《礼记·曲礼下》:“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岁遍。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岁遍。大夫祭五祀,岁遍。”^⑥可见,门祀这一特殊的文化现象在商周时期已被纳入国家礼制,成为上至天子诸侯,下至黎民百姓所遵循的合法礼仪。同时,门祀制度形成也为后来门神信仰这一民俗现象找到了文化的源头和历史的依据。

门祀这一文化现象的成因根源于原始宗教的鬼神观念,“中国民众世界是由人神鬼组成的,民众的理

①庄子:《庄子》,王先谦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09页。

②墨翟:《墨子》,王云五、朱经农主编,唐敬果选注,北京:商务印书馆,1930年,第62页。

③[德]Julius·E·利普斯:《事物的起源》,汪宁生译,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2页。

④(西汉)刘安:《淮南子》,杨坚点校,长沙:岳麓书社,2015年,第135页。

⑤(汉)王充:《论衡》,陈蒲清点校,长沙:岳麓书社,1991年,第395页。

⑥戴圣:《礼记》,崔高维校点,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3页。

念世界是圆形的，除了人的世界，还有一个神、鬼的世界与生存之地。”^①在此种观念的统摄下，门成为隔绝外部世界与超自然力量的屏障，为了抵挡鬼魅邪祟的侵入，超自然的门神发挥着震慑恶鬼的神奇力量。最初的门神只是一种概念化的抽象实体，不存在具体的形象所指，尽管这种理念化的想象是无形的，但它却像宗教世界中的“上帝”般施展着护佑众生的能力。基于平安意识的生存本能，民众不遗余力地通过多元化的仪式行为演绎着对门神的神秘主义崇拜。随着制度化的门神信仰在民间的传播，为这种虚无主义的理念门神具象化提供了现实的可能，而口头文学的神圣叙事则直接为门神形象的人格化提供了文本依据。据《论衡》援引《山海经》记载，“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曲蟠三千里，其枝间东北曰鬼门，万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郁垒，主阅领万鬼。恶鬼之害，执以苇索而以食虎。于是黄帝乃作礼以时驱之，立大桃人，门户画神荼、郁垒与虎，悬苇索以御凶魅。”^②此外，在《风俗通义》《枕中书》《历代神仙通鉴》《荆楚岁时记》等文献中也详细记载了“神荼”“郁垒”的故事。神荼、郁垒因具有捕食恶鬼的功能，被民众赋予崇高的地位，成为镇守一方安宁的门神，而与二人同时出现的“虎”与“桃木”也在故事的演绎中被赋予了文化学的象征意义，传达着民众对平安的希冀。这些文学形象的出现间接为后来的门神奠定了神圣的基调，鞭鬼打鬼的钟馗，赶瘟驱疫的判官，驱邪消祟的神话英雄以及镇鬼捉鬼的飞禽猛兽，无不各显神通地守护着积善之家的平安。如果民间文学中的门神形象只是一种文学典型的意象化，那么经过文学想象渲染的门神图像以更为直观、真实、丰满的形象讲述着门神的神圣叙事。汉代画像石、画像砖中的门神图像，文学典籍中的门神插图，春节张贴的门神年画透视着门神信仰的发生。尽管不同历史时期、艺术媒介所导致的门神形象呈差异化，但门神信仰的文化意涵和象征意义并未因形象的差异而有所改变。正如乌格里诺维奇所指出的，“神的象征是对神的一种‘不似的临摹’，跟现实主义的艺术形象不同，象征与所象征的对象没有直接相似之处，象征‘标示’对象但不反应对象。”^③在这种情况下，门神究竟是何形象似乎无关紧要，重要的是门神是否符合民众对门神形象的期待视野，其文化功能是否满足民众对门神的心灵归属与精神寄托。

“在历史的长河中，每一种民俗都必然发生着或大或小、或迟或速的变化，有的日趋繁荣，有的逐渐衰落。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取决于社会生活的需要以及各种民俗满足这些需要的功能状态。”^④以“神圣”“虚无”“神秘”为主导的门神信仰，在时间跨越和民俗演变中，随着理性主义的洗礼，开始从自然、神灵崇拜过渡到英雄、文官崇拜，从驱鬼、辟邪、镇宅等超验功能衍化为求吉、纳福、祈愿等世俗功能。作为门神信仰物质载体的门神年画，也在文化传承中，淡化了鬼神观念，增添了几分世俗化的生活气息。战功赫赫的英雄，笑容可掬的文官，寓意祯祥的符号成为门神年画的主要表现形式，门神从天国降落凡尘，凝结为一种生活化的信仰或信仰化的生活。

门神年画和门神叙事作为门神信仰的艺术表征，完整而全面地还原了门神信仰的文化思想史，尽管门神信仰“随着时代的发展呈现不同的形态，也因历史、政治、经济等各种因素的发展而不断地变化着，但是其驱鬼避灾与迎祥纳福的信仰重心一直保存与延续，”^⑤是平安意识在信仰领域中的生动体现。平安意识是人类生存的本能意识，是为寻求自身安全与繁衍生息所形成的心理机制。从远古时代到现代社会，人类总会面对种种不安定因素对人身构成的威胁，如自然灾害的威胁、战争的威胁、疾病的威胁甚至死亡的威胁，在种种难以预料的危险面前，人类往往分身乏术，在这种情况下，人类不得不利用超自然的门神守护民众的精神家园，以抵御不期而至的灾难，获得安身立命的机会。

二、安全建构：“门神”信仰的科技理念和技术外延

理性主义与民间信仰之间能否共存，一直以来在学术界饱受争议。持否定观点的学者坚持认为，民间

①毛巧晖：《生活化的信仰 信仰化的生活——简论门神信仰的功能》，《殷都学刊》2016年第2期。

②王充：《论衡》，陈蒲清点校，长沙：岳麓书社，1991年，第350页。

③[苏]德·莫·乌格里诺维奇：《艺术与宗教》，王先睿、李鹏增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第122-123页。

④陈建宪：《试论民俗的功能》，《民俗研究》1993年第2期。

⑤毛巧晖：《生活化的信仰 信仰化的生活——简论门神信仰的功能》，《殷都学刊》2016年第2期。

信仰在科学理性主义的冲击下,已经丧失精神内核,处于被动消解的颓势。而刘锡诚曾针对,“对人类历史上创造的任何文化现象,不是科学地探究其合理性和规律性,而只习惯于简单地以进步或落后、有益或有害、好或坏等政治概念和二元对立的方法论给予判决,于是,就把民间文化,特别是其中属于民间信仰(如神鬼信仰、巫术迷信等蒙昧意识)范围的种种文化事象统统归为封建迷信,将其消极的影响看得很重,视之为人类理性思维和当前意识形态的对立物”^①这一现象给予了有力的回击,体现了学人对待民间文化的客观评价态度。门神信仰作为中国民间信仰体系中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它融合了中国传统的鬼神观念、巫术仪式、吉祥崇拜等文化基因。尽管这些观念在当代社会看似有违科学伦理,但它们并未在与理性主义的冲突中分崩离析,而是隐匿在科学世界观的背后悄悄地发挥着规范人类行为和提供情感宣泄的潜在作用。

不可否认,以西方理性主义为主导的科学世界观,在破除宗教神权束缚、激发主体意识的觉醒,以及物理学的发展方面的确产生了不可预估的社会效用。物质生活的丰富,社会财富的积累,科技领域的变革,彻底改变了人类传统的生活方式。理性主义看似为科技的进步和世界文明史的演进开辟了一条科学的通路,但是这条通路能否持续可行尚需深思。人类的全面异化,道德价值的全面沦陷,精神领域的虚无主义,似乎验证了这条通路正逐步背离人类文明的正道。理性主义并非无所不能,科学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并不能解决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一切问题,这点从人类社会的文化史中已经得到了证实。物质生活并不代表人类生活的全部,和平与安定亦非现今人类社会的普遍现状,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也仅仅是人类一种乌托邦式的遐想。而真正的现实却是,人类不得不面对各种难以预料的意外,不得不面对如期而至的死亡,不得不面对精神世界的空虚,面对这些问题,科学束手无策,再高深的技术也无法医治精神领域的顽疾,这一切唯有依赖信仰。马林诺夫斯基在《文化论》一书中指出,“无论有多少知识和科学能帮助人满足他的需要,它们总是有限度的。人事中有一片广大的领域,非科学所能用武之地。它不能消除疾病和腐朽,它不能抵抗死亡,它不能有效地增加人和环境间的和谐,它更不能确立人和人之间的良好关系。这领域永久是在科学支配之外,它是属于宗教的范围。”^②

随着全球一体化格局的确立,科学世界观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化缝隙中,甚至在较为原始的部落也潜藏着某种文明的因子,从而使科学世界观成为当今世界文化的主导思想。同样,中国民间信仰也未能在科学世界观的影响下独善其身,无论民间信仰的表现内容、信仰形式抑或仪式展演,均由内而外发生着显著的变化。其实,不仅在当代社会如此,自古以来,民间信仰就是在政治、经济、文化、观念等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下不断传承演变的,尤其是科学的发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民间信仰的传承路径。正如门神信仰的演变历程所揭示的,从最初抽象的门神,口头文本中的虚拟门神,到画像石、画像砖中具象化的门神,雕版印刷普及后的年画门神。门神形象也经历从原始的捉鬼打鬼的门神,驱邪禳灾的门神,到求吉纳福的英雄、文官、仕女门神的转变。对门神的祭祀仪式,同样经历了从野蛮可怖的人与动物的献祭,到寓意祥瑞的门神年画、对联等对门的装饰。可见,门神信仰的传承演变就是一个从野蛮走向文明,从神圣走向世俗,从原始走向科学的不断“祛魅”的过程。回溯历史,门神信仰的表现形式和艺术载体在时代变迁中被不断赋义,这种赋义无非是顺应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社会、观念、群体等适时作出的一种文化调整,无论是文学的、艺术的还是仪式的。尽管如此,门神信仰所蕴含的特定功能和精神意涵并未随时间流逝而发生改变,平安意识一直是门神信仰传承千年最基本也是最根本的内在动因,是人类长期以来为解决生存焦虑而形成的稳定的心理结构,不因时间改变而消逝,也不因科学世界观的存在而泯灭。

科学技术是理性主义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产物,科技理性也就是由科技活动体现出来并实际地支配着科技活动的最基本的思维方式,它以客观、理性、科学的态度对日常事务作出价值判断。科技理性催生下的高科技产品使人类生活更加便捷、高效、智能,从而颠覆了数千年农耕文明的生活方式。同时,这种科技化的生活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技术手段为平安的生活提供了更加多元的技术支持,门神信仰由此获得了科技的保障。电子眼、指纹密码锁、监控设备、天眼追踪、电子起降杆等高科技产品似乎取代了门神的地位,成为保障家庭、村落及社区民众安全的“新”门神。基于此,不得不说科技的变革的确为人类的日常生活提供了某种安全的保障,但这是否意味着科技手段能够真正替代信仰的功能而不再笃信门神,答案无疑是否定

^①刘锡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性质问题》,《西北民族研究》2005年第1期。

^②[英]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费孝通等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48页。

的。民众并非不知道这种类似的科技产品并不能让其高枕无忧，科技产品只能监控人的不端行为，并不能有效阻止侵害的发生。科技变革下的技术手段无非是门神信仰在当下生活方式中的技术外延，无论未来的科学技术发展到何种程度，人类对平安的希冀绝不由科学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而丧失。

三、平安共同体意识：门神信仰的家国意识和文化认同

门神信仰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演进，人类的居住形式经历了从穴居到巢居、从半穴居到筑屋定居的转变；门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实用到装饰、从单一功能到多功能的变化；门神经历了从抽象到具象、从文本到图像、从可怖到亲善的变迁；门神信仰经历了从神圣到世俗、从神秘到去魅的转化。门神信仰看似在民俗文化的传承中悄然发生着变异，但平安观念这一门神信仰的精神实质并未因文明的演化而发生动摇。无论在安定的和平年代抑或动荡的历史转折时期，民众从未放弃对平安的追求，这是数千年来民众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复杂的社会关系形成的一种基于自我保护的心理机制和思维习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它难以受到移风易俗的侵蚀而丧失其精神属性。

如果早期对门的神秘主义崇拜是先民个体自由意志的选择，那么随着家族聚落的形成，对门这种安全屏障的依赖则成为集体化的生活方式，而阶级社会的诞生则使门神信仰呈现出鲜明的民间文化个性，商周时期统治阶级将“门祀”文化列入国家礼制，则使门神信仰成为国家制度化的保障。时至今日，门神信仰依旧是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众通过一系列的神圣叙事和仪式活动，演绎着民众对平安的祈愿。与此同时，与门神信仰相关的神话、传说、岁时节令、仪式展演及文化空间等被官方纳入国家话语体系中，成为民俗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来看，门神信仰不仅仅是生活在底层的民众所共享的文化形态和生活方式，而是已经上升到国家层面成为一种国家礼制，体现出一种礼俗互动的文化特质。民间需要门神信仰的神奇力量为民众搭建一道无形的安全屏障以获得平安的心理体验，国家依赖门神信仰中的平安观念建构一种家国意识共同维系着社会的运行。张士闪教授指出：“在中国社会语境中，‘礼’‘俗’既是一种社会现象，又是一种话语形式……代表了自古及今中国社会的某种普遍现象与社会思想的一般特征，二者之间的互动实践奠定了国家政治设计与整体社会运行的基础。”^①在《汉书》中记载的“礼失求诸野”或许可以从文化侧面理解民间信仰的礼俗文化内涵。

门神信仰向来不是个体孤立的选择，也并非民间私自裁决的文化特权，而是在“以俗入礼”与“化礼成俗”的双向互动实践中建构起民间信仰的文化基础。因此，对门神信仰的解读不能单单从民间“俗”的单一维度做狭隘的阐释，如何上升到国家“礼”的范畴并形成一种家国意识与文化认同或许是建构平安共同体的文化支撑。平安共同体意识是指特定聚合关系中的成员，在感知自我与他者生存发展的共性条件基础上，所具有的价值规范与能动凝聚意愿。这种意识不仅是一种社会治理模式，也是一种价值追求，它强调成员之间的相互依存和共同福祉，旨在通过团结协作维护社会的和谐与安宁。

在生产欠发达的农耕社会，对土地这一生产资料的保有是传统家庭得以存续的经济基础，而这一切的获得离不开国家制度的法理保障，尽管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与政治博弈不是普通民众所考虑的问题，但民众却深知国家秩序的稳定与否对他们而言意味着什么，因此，家国意识始终根植于普通民众的内心深处构筑了一道平安的围墙。在此背景下，“门神”之“门”或许已不再泛指普通的家庭之“门”，如果将眼光向上会发现，国家之“门”的安全才是维护家庭之“门”的前提与保障。“门”既是一种可见的物质实体，也是一种平安的文化符号，它既代表着物理空间的分隔和通道，也象征着平安、庇护和界限的文化内涵。由此，门神信仰不仅仅体现为对家庭平安的简单祈愿，更是对国家安定、社会和谐和深切的期盼。在古代中国，每当国家面临危机与动荡，民众对门神的信仰更为笃定，他们寄希望依仗门神的神奇力量，守护家国，抵御外敌，维护社会的和平与稳定。这种信仰体现了民众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以及对平安生活的热切渴望。在现代社会，虽然门神信仰的形式和内容可能发生了变化，但其核心精神依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身份认同危机、价值认同危机、文化认同危机等日益凸显，国际间的政治博弈、利益冲突、军事摩擦、文化碰撞等始终是对外交往过程中难以回避的时代症结。因此，民众对平

^①张士闪：《礼俗互动与中国社会研究》，《民俗研究》2016年第6期。

安的需求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表现得都要强烈,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将面临着全新的挑战。门神信仰作为中国传统的民俗文化现象,其中所蕴含的家国意识或许可以成为强化社会共识、增强国家凝聚力的文化纽带,其蕴含的驱邪避恶、祈福迎祥的思想对于激发全体民众积极参与社会治理,构筑和谐美满的平安社会提供了精神支持和实践路径。同时,门神信仰中丰富的文化资源也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门神形象的建构、门神传说的传播、门神年画的张贴、信仰仪式的展演、文化空间的塑造等,都蕴含着丰富的历史记忆与文化基因,它们通过口耳相传、图像描绘、戏曲演绎、民俗行为等方式代代相传,成为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标识。这些文化元素不仅丰富了民众的精神生活,也联通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多元文化,增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门神信仰以其独特的方式,守护着家庭与国家的平安,传承着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建构平安共同体的文化基础,为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强有力的文化保障。

结 语

门神信仰历经数千年的文化传承已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经过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它构成了民众生活化的信仰系统。尽管门神信仰的形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生着或大或小的变化,但其驱邪禳灾、祈福迎祥的平安理念并未随着社会的变迁和时代的发展而有所改变,尤其在科学理性主义甚嚣尘上的当代社会,门神信仰中蕴含的平安意识完成了精神领域的安全建构,平安意识与科技手段的相互叠加为民众构筑了一道安全的屏障。门神信仰作为一种民间集体性的信仰活动,不仅体现为民间的集体记忆和世俗情感,而是上升为国家层面的一种制度性文化现象,它在礼俗互动的基础上,实现了民间与国家层面的文化联结和互动。时至今日,门神信仰所特有的精神价值依旧发挥着积极的能动作用,它激发了全体民众对家国文化的强烈认同,促使民众团结一心,共同参与维持社会运转、维护社会稳定、完善社会治理体系之中。在此基础上,门神信仰为构建一个和谐美满、平安稳定的中国贡献了积极力量,并进一步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坚实的文化保障,这种信仰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更是对现代社会治理与文化建设的一种有益补充。

The Sense of a Peaceful Community in the Belief of “Door Gods”

——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Door God New Year Pictures in North China

ZHANG Qian-qian

(School of Arts and Design,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25200, China)

Abstract: The belief in door gods, which takes door god New Year pictures as its material carrier, is a folk cultural phenomenon that has lasted for thousands of years in the Chinese nation, reflecting the collective demand of the people for a peaceful life.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door god New Year pictures in North China, it is found that although the door god New Year pictures have presented different forms in the course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e concept of peace contained in the door god belief has not undergone fundamental changes. Together with scientific rationalism, it has built a safe barrier for the people. In the cultural context of the new era, the folk tradition of door god belief still holds positiv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contemporary life. Based on the interaction of customs and rituals, it has achieved cultural connection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people and the state, stimulating a strong sense of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culture of the country and the family among all the people, and providing a solid cultural guarantee for further consolidat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as a community. This belief not only inherits and promotes traditional culture, but also serves as a beneficial supplement to modern social governance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Key words: Belief in door gods; the sense of a peaceful community; safety awareness; ommensurability of family and state; cultural identity

[责任编辑 山阳]